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文献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MEGA文献研究

[韩] 郑文吉 著 赵 莉 尹海燕 彭 曦 译 方向红 校译 张一兵 审订

The Horizon of Marxism in Korea

我们推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撰写
基本上按下面的这些步骤进行

- (1) 最初的草稿(Entwurf)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围绕草稿的讨论
- (2) 经过对草稿的修改、完成誊清稿
- (3) 根据誊清稿，作文句与内容的增删，再加入编辑上的指示(Angabe)
- (4) 最后形成用于出版的最终稿(Druckfassung)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文献学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MEGA文献研究

[韩] 郑文吉 著 赵 莉 尹海燕 彭 曦 译 方向红 校译 张一兵 审订

**The Horizon of
Marxism in Korea**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 MEGA 文献研究 / (韩)郑文吉
著; 赵莉, 尹海燕, 彭曦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07608-4

I. ①德… II. ①郑… ②尹… ③赵… III. ①德意志
意识形态—马恩著作研究 IV. ①A8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413 号

Jung, Moon-gil

THE HORIZON OF MARXISM IN KOREA

Copyright © 2004 by Jung, Moon-gi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9-101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 MEGA 文献研究

著 者 [韩]郑文吉

译 者 赵 莉 尹海燕 彭 曦

校 译 方向红

审 订 张一兵

责任编辑 陈 佳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3.25 插页 4 面 字数 308 千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608-4

定 价 39.8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

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写在前面的话

初次遭遇郑文吉教授的思想，是在德国学者陶伯特女士所作的一篇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文章中，在那里，陶伯特提到，有一位韩国学者郑文吉对她的编辑方案持有异议。从陶伯特的评论中，我直觉到这个我们尚不了解的郑文吉很可能是一位重要的马克思文献学专家，这就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此后不久，我又在无意中拿到了一篇郑文吉本人所作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日文版论文，并在南京大学日语系彭曦博士的帮助下，第一次与郑文吉的研究成果有了直接的接触。这一接触的结果，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领域，过去我所知道的只是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以及广松涉。其中，巴加图利亚既是文献学专家、也是思想家，而陶伯特只是一位文献学专家；至于广松涉，则主要是一位思想家，只不过曾在早期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些问题做过一定的文献学研究。而比之前三位而言，郑文吉的情况显然还要更意思一些：早期，他曾是一位哲学研究者，其成名之作就是关于马克思和弗罗姆的异化思想研究（《异化论研究——以马克思、弗罗姆以及社会学上的异化论为中心》，博士论文），可是后来他却又转变成一位文献学专家，并且，一转就是20年。在这漫长的20年里，“孤独”的郑文吉只做了一件事，即从事MEGA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研究。

此处，我们不妨先对郑文吉教授的基本情况做个了解，在此基础之后再来看看他在马克思文献学研究方面的具体贡献。郑文吉（CHUNG, Moon-Gil），1941年11月20日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1960—1964年就读于大邱大学（现岭南大学）政治系，1964—1970年为首尔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71年起，任教于高丽大

学,1975 年任副教授,1978 年开始任教授;2007 年,从高丽大学的教职上退休。此外,郑文吉在 1979—1980 年为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4—1985 年为德国伯弗姆大学客座研究员,其间,曾两赴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以下简称 IISG)访学。1991—1992 年为日本东北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2000 年间,郑文吉任高丽大学政治科学与经济学院院长。郑文吉的代表性论著包括:《异化理论研究》(1979 年);《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1987 年);《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1994 年);《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2004 年);《尼伯龙的宝藏》(2008 年)等。

2007 年 2 月,我在首尔的延世大学见到了郑文吉教授,双方一见如故。当时,郑教授刚从高丽大学退休,当知道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情况有所了解之后,他表示十分惊讶。在交谈中,我感到面前这位韩国人确实是一位具备踏实学术功底的严肃学者,他言谈之中流露出的那种谦逊温文的风度也体现出我们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品格。比之一些腹中空空抑或仅略知皮毛就张牙舞爪的人来说,郑文吉是我更喜欢的一类学者。也是在那次见面时,我了解到郑文吉早先曾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后来则一直在专门从事关于 MEGA,特别是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深入交流之后,我大体能够肯定,郑文吉的研究成果对国内正在兴起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而言,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于是我当即决定,要将这位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来,事实上,在那次见面的后半段,我们即已开始讨论如何向中国学界译介他的研究成果。当时我们就已形成了共同的结论,即首先出版一部能够反映郑文吉教授这些年来研究和思考 MEGA 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成果的论文集。

郑教授的认真严谨是十分令人感佩的:回国之后不久,我便收到了他托人带来的七八部论著以及相关文集,并且,在每部书中,他皆仔细地对相关的章节或篇目做了遴选,并用贴纸做了显著的标记;在文集里,也列出了详尽的目录。于是,我们在 2007 年中开始了对郑文吉教

授文集的翻译工作;2008年9月,郑教授又传来了他为这部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2008年10月,郑文吉教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访学期间他先后为学生作了两场学术演讲,与我们学科的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从内容上考察,郑文吉最早发表的一批论文大多是与异化理论的研究相关的。196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人的自我异化研究”的介绍。从其时开始到1978年间,他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都集中在对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弗罗姆的异化观点的评述和研究领域。我估摸着,这批文章大略应是他做博士论文的先期成果。1978年,郑的博士论文《异化论研究——以马克思、弗罗姆以及社会学上的异化论为中心》(*A Study on the Theories of Alienation*,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78)。从1980年开始,郑文吉的研究兴趣逐步转向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郑文吉的主要关注点一直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诸多思想家,特别是这些思想家对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上。很有意思的是,他尤其重点关注了施蒂纳和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1984年,郑文吉赴德访学,期间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G)停留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对他的学术思考而言可以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转折。

郑文吉教授自己提到,他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并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意识到了马克思第一手原始手稿文献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上文提到的那次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所作的为期2个月的考察和停留期间,他亲眼看到了《1844年手稿》以及其他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手手稿文献,他看到了原始手稿与编印成书的出版物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对于深入理解经典文献的原始生成情境是至关重要的。此后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的学术研究。1986年,郑文吉在《韩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介绍“IISG”马克思、恩格斯

文献保存情况的文章；1987 年，又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The Age of Epigones: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87, pp. 331）一书，这应该是他此前几年中关于青年黑格尔派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同年，他发表关于马克思《1844 年手稿》文献编辑与研究争论的论文。接着，在 1990 年，郑文吉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辑历史的论文，文中重点对陶伯特编辑出版的 MEGA2 I / 5 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先行本作了讨论。次年，郑文吉发表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版本的历史性研究论文[“Text Variations of the Chapter I. Feuerbach, the First Volume of German Ideology by Marx and Engels: Critical Comments on Various Editions since Rjazanov”, *World Literature*, No. 59 (Spring 1991), pp. 315 - 344 and No. 60 (Summer 1991), pp. 259 - 286.]，在该文中，他比较和分析了自梁赞诺夫以后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出版的各种不同的编辑方案。1993 年，郑文吉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动机的研究论文[“Die Deutsche Ideology Was Written as a Collection of Article of a Quarterly Journal? Recent Debates on the Genesis of Die Deutsche Ideologi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o. 22 (Summer 1993), pp. 624 - 678.]，在其中，他重点讨论和反驳了戈劳维娜的“季刊说”。次年，郑文吉又发表了评述日本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出版和研究的文章[“Japanese Debate on Die Deutsche Ideolog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o. 25 (Spring 1994), pp. 329 - 398.]，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出版史以及广松涉版之后的学术争论情况进行了一次综合性的全景分析。此后不久，他出版了学术分量很重的《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及思想生成》（*Marx's Early Writings and Making of His Thought: Studies on "The German Ideology" and the MEGA-Publication Project*,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1994, pp. 571）。之后，郑文吉发表的论文就集中在对 MEGA 计

划的讨论,以及对韩国马克思研究的历史分析上了。2004年,他出版《韩国的马克思学视域》(*The Horizon of Marxology in Korea: The Editorial Problems of Marx' and Engels' Texts and Researches on Their Works*, Moonji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2004, pp. 365)一书。

读者手中这部由郑文吉教授亲自为我们选编的文集里,收录了他最近20多年来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MEGA研究中写下的最重要的一批论文。我想,这些论文当是可以整体映现出郑文吉在MEGA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水平的。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从这本文集中发现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首先,我们不难看到,当今国外马克思文献研究的基本操作平台已经是直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的了。郑文吉教授熟练掌握德文,甚至可以直接识别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中的文字,这就使他的文献学考证和版本比较研究得以建立在可靠的第一手文本的基础之上。其实,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除掉本来就是德国人的陶伯特(Inge Taubert)和佩尔格(Hans Pelger)之外,诸如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日本学者广松涉和法国学者格朗炯(Jacques Grandjón)等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者就一直是原文或原始手稿,以及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的。郑文吉教授访学南京大学期间,为学生作了一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演讲,当时他所使用的相关引文就全部是原始手稿的复制件,并且,在这批复制件手稿上,我们看到了郑文吉教授留下的大量标识和批注。前不久才到南京大学讲学的俄罗斯专家巴加图利亚教授也是如此。后者既是MEGA2的倡导者,也是MEGA版的重要组织者和直接编辑者。用俄罗斯学者波洛夫教授的话说,巴加图利亚早就“嫁给”这些手稿和文献了。我觉得,他们这种扎实的科学文献学研究方式,与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习惯性地研究建立在二手资料之上的伪文献学考证思路相比,是完全不同的。我以为,这也是郑文吉这部文

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文献学和版本研究？！

其次，与我们先前已经熟悉的一些文献学家不同，郑文吉的文献研究常常是处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语境之中进行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我们知道，从梁赞诺夫开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的文献学家都喜欢标榜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某种独断的真理性，梁赞诺夫和广松涉应是其中的典型，而陶伯特虽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诩为圣言，但我们也不难从包括她在内的一批德国学者身上看到一种不自觉地散发出来的日尔曼式的优越感。对此，郑文吉教授在我们的交谈中表示，他也有同感。其实，就在前苏东体系崩溃之前，她（他）们的研究也都只不过是苏联意识形态话语的应声虫罢了。更有甚者，在前不久到我国学界来出糗的某些日本学者身上，这种倾向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郑文吉的思想与上述倾向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研究思路是对所有历史文献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评价，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差异所在，从而才能更好地推进文献学以及对于文本本身的思想研究。在郑文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版本的历史性比较分析中，在他对日本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争论的综述中，在他针对韩国马克思学的历史发展所作的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显著的特点。我以为，这也是由文献学研究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文献学的资料分析并不是要生产出绝对真理，而是要为人们进一步的文本分析提供尽可能准确的资料和历史性文献依据。但是，历史文献中又总是包含着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如历史当事人的不在场、文献的不完整、文献生成时间的不确定等等，这就使得任何文献学研究的成果都必然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以文献学的历史性认知结果来建构意识形态的拘役构架是一种让人无法发笑的现代学术笑话。

其三，虽然郑文吉的马克思文献学研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当今马克思学的较高水平，可是他倒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哪里指手画脚，鼓吹和

标榜自己的权威,而是始终踏踏实实地做他的学问,为 MEGA 的编辑和出版默默无闻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自己的研究所面临的处境,郑文吉不无感慨,他说自己在韩国是孤独的:在过去的军事独裁时代,研究马克思不合法;即便到了今天,韩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研究也还处于学术的边缘。不过,这并不妨碍郑文吉成为韩国最好的高丽大学的杰出教授。曾经在高丽大学留学的尹海燕教授告诉我,在学校里,学生们都亲切地称郑文吉作“异化教授”。不久前,我与到访的高丽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鱼允大教授有过一次会面,后者也向我证实,郑文吉教授在高丽大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南京大学举行的学术演讲中,郑文吉教授告诉台下的中国大学生们,他的学术研究生涯是“孤独的 30 年”,但而今,在退休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却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得到承认,他觉得过去艰难而孤独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想,郑文吉教授倾 20 年心血而为的文献学研究,同样是值得我们向他表示深刻敬意的。

在编译这部文集的过程中,郑文吉教授一直在给予我们直接的指导和建议。与广松涉哲学思想编译初始时的情况相仿,我和南京大学韩语系主任尹海燕教授、从韩国回来的赵莉博士、从日本回来的彭曦博士以及远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方向红博士一起,组成了一个编译小组。从 2007 年中开始,我们在大量前期文献准备的基础上,开始边翻译边讨论,并随时向郑文吉教授讨教,就这样共同奋斗了将近一年半。其中,赵莉博士翻译了本书的第 1、2、4、6、7 章;尹海燕博士翻译了本书的第 6 章、第 8 章;彭曦博士翻译了第 3 章和文集中所有日文文献的注释和书目;方向红博士校译了占全书内容近五分之一的大量德文引文、文献索引和注释。在他们辛勤工作的基础上,我再从专业学术的角度进行了整理和统稿。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看到郑教授所做的文献学工作,我们在翻译他德文文献引文和注释时,同时保留了德文原文。2008 年临近秋叶飘尽的时候,我们终于完成了郑文吉教授的这本文集翻译编校工作,正式交付出版。由此,我们就可以将郑文吉这位重要的马克

思文献学专家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了。

感谢郑文吉教授,特别是他为中国读者写下的中文版序言。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老师们。

我希望,我们流下的汗水是值得的!

张一兵

2008 年 11 月 23 日于香港沙田

本书作者中文版序

本书汇编了笔者 1990 年以来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研究所撰写的八篇文章。其中,前面的四篇论文从手稿的构成及编纂史的角度,探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和思想意义;后面的四篇论文则集中讨论了手稿形态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I.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再现问题。

1960 年代初,笔者在阅读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的过程中,思想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此,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笔者曾醉心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而 1970 年代末以后,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笔者逐渐对其异化论的渊源——《1844 年手稿》的“手稿形态”有了认识,并最终确信:要想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未刊行遗稿,其前提必须是对遗存手稿的原稿撰写样式和状态有所了解。1985 年,笔者在阿姆斯特丹^①停留了两个月,这两个月的时间不仅使笔者获得了审视《1844 年手稿》之遗稿形态的眼力,并让笔者得出结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基于两人遗稿而出版的著作,其真伪与否不能草率地加以判断。

这以后,笔者的关注对象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在“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基础上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上。这不仅是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写作时间上与《1844 年手稿》相邻,还因为这两个著作的手稿都保留了原初的形态,让我们得以见到马克思主义形成期中马克思、恩格斯两人思想的生成过程。然而,这两个著作

^① 郑文吉这里指的是荷兰皇家科学院所属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 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 in Amsterdam)”。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手稿的原始文献中的 70% 都保存在那里。——审注。

的手稿文本却在规模与复杂性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1844 年手稿》是马克思为帮助自己理解所做的经济学文献摘录，并对自己的思想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一部手稿。对于这一手稿的再现问题及该著作所包含的三个笔记，只要对比巴黎时期撰写的其他摘录笔记^①，来理清之间的相关关系，则在文本的编纂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而且，标榜严格根据原稿来再现和收录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的 MEGA2^② 中，已用两种方式刊载出版了该手稿的文本。^③ 关于《1844 年手稿》这一版本妥当与否的讨论，笔者已通过书评形式得以展开。

与之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且出于当时出版的需要，屡经修改、删除及编辑，因此手稿的成形经历了各个不同阶段（尤其是第一卷中的“Ⅰ. 费尔巴哈”章）。且恩格斯逝世之后的 19 世纪 90 年代末与 20 世纪初，在未经对著作本身结构或特点的具体考察，前苏联学者就片段式地发表了该手稿中的一部分。而该著作第 1 卷的“Ⅰ. 费尔巴哈”章，从 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一直到 21 世纪，虽得以各种版本出版，但却缺少一个说得过去的定本。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整体规模庞大，其中的手稿也多种多样，不仅是第 1 卷中的“莱比

① 指青年马克思于 1843 年 10 月到 1845 年 1 月在巴黎写下的第一批经济学摘录和研究笔记。共有 10 个笔记本，其中 3 个笔记即为《1844 年手稿》。具体情况可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和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二版，第 2 章第 2 节。——审注。

② 郑文吉这里原来使用的是“新 MEGA 版”，即 20 世纪 70 年代由前苏东马列主义编译机构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 历史考证第二版），为方便中国读者阅读，中译文将其改译为“MEGA2”。而此书中的“旧 MEGA 版”，即指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由前苏联马列主义编译机构组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 历史考证第一版），则改译为“MEGA1”。MEGA 版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成熟的文本，第二部分主要为《资本论》及手稿，第三部分为书信等文献，第四部分为笔记类文献。在 MEGA 研究的习惯用法上，人们通常将第一部分第 1 卷简写为“Ⅰ/1”，本书作者的做法基本类似。关于 MEGA 的出版情况可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二版，附录。——审注。

③ MEGA2 Ⅰ/2, 1982, S. 187–322（第 187—322 页）；S. 323–438（第 323—438 页）。

锡宗教会议”等手稿,还有第2卷中有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手稿和印刷稿,其中哪些应该属于该著作的主文本(Haupttext)? 哪些应该收进附录? 这些问题都没有讨论成熟。有鉴于此,我们对MEGA2 I/5寄予了很高的期望。20世纪50年代东德发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 Bd. 3, 1958),该著作集未见增补具有学术意义的内容,在编纂方法上也没有改进,只是原样沿袭了在完成程度上还存有疑问的MEGA1 第I部分第5卷(MEGA1 I/5, 1932),且这一处理方式成了惯例,该版本也渐成“定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MEGA2 I/5的期望也更加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虽然自MEGA2开始出版已有30多年,但MEGA2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出版仍在推延,围绕《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而展开的讨论也仍在继续。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筹划阶段,MEGA2就已经在为早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精髓——《德意志意识形态》做准备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I. 费尔巴哈”章曾在试行版中尝试刊载^①;1980年代末,编纂者陶伯特^②曾明确表示,刊载该著作的MEGA2 I/5将于1990年代初出版。但是,因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及MEGA项目的主体——柏林和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的解散,MEGA2的出版停顿下来。之后,随着MEGA2出版工作的发行权被移交给新组建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也于1992年转至以特里尔的马克思故居为中心的德法MEGA工作组。德法MEGA工作组遂纳入原东德IML的陶伯特作为共同编纂者,加紧进行对MEGA2 I/5的编纂,但因该团队的另一编纂人格朗炯(Jacques Grandjone)的过早去世,以及佩尔格(Hans Pelger)的退休,他们历经10年的努力终成未竟状态,用作收尾的,是21世

① MEGA2 Proband(试行版), 1972, S. 33—119, 399—507(第33—119页;第399—507页)。

② 陶伯特(Inge Taubert),前东德文献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担任《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编辑整理工作。——审注。

纪初以 MEGA2 I /5 暂定版(Vorabpublikation)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Ⅰ. 费尔巴哈”和“Ⅱ. 圣布鲁诺”。^①

一直以来,笔者为配合 MEGA2 I /5 的刊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编纂问题进行着研究。因其出版一推再推,而新出现的研究对象及论争案例又不容疏忽,故一直到最近,笔者都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Ⅰ. 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编纂问题作着持续的讨论。笔者所作的讨论,原则上接受 MEGA2 的基本编纂标准——文本的完整性、忠于原稿、从形成史的角度再现文本,这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笔者期待着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定本的 MEGA2 I /5 早日出版,来平定围绕该著作文本而产生的各种讨论,或以这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文本为出发点,来展开新的论争和解读。从这一意义上,希望本书能为加深现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MEGA 项目组所推进的 MEGA2 I /5 编纂工作的理解,或促其早日出版,尽上一点绵薄之力。

也因之将自己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章重新汇集起来在中国出版中文译本,所以笔者对要刊入其中的文章进行了重新阅读,结果发现该书有些薄弱点是不能不提的。这中间最扎眼的,便是相隔 20 年所写下的这些论文在前面部分多有重复。这是因为,收入该书的文章是在不同的时期和情况下发表的独立论文,作为论文,有其各自的体例,而在情况发生变化后,为拓展包括专家在内的普通读者的理解,这样的做法是不可避免的。但当这些论文汇编成书时,这些重复的叙述以及类似的图表频繁出现,成了无法回避的瑕疵。出版该书时,笔者并非没有考虑过要对这一部分进行删除或予以统一,但回想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笔者相信,尽管该书具有这些薄弱点,但若保留下来,则可作为一种尺标,来了解各篇论文发表时笔者的想法和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情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 年),第 400 页(Marx-Engels-Jahrbuch 2003, 28* + 400 S.)。